

目摇摇录

[员]	北京城的童年
[员园]	姐妹
[员源]	母亲
[员愿]	我是家中最不听话的孩子
[猿园]	流亡学年
[猿园]	初恋青春，烽火挚情
[缘愿]	逃亡——从香港到大后方
[远愿]	太太的假期
[苑猿]	乡居
[愿园]	八年之爱
[愿猿]	定居华盛顿
[怨园]	独闯美国上层社会
[员园园]	开创一片天
[员缘缘]	华府工作历程
[员愿员]	母亲的烦恼
[员愿猿]	女儿入学记
[员缘缘]	在美国写书
[员园园]	追思节
[员愿愿]	二十年寒暑忆君深
[员愿员]	一年的回顾
[员愿源]	华府春秋
[员愿远]	华府友人
[员缘缘]	我的空中生活
[员园园]	旅行者的自白
[员园愿]	访问板门店

陈香梅全集·卷四

- [圆员] 东游琐记
[圆元] 吊古战场
[圆元] 火山国风情画
[圆圆] 欧亚游踪
[圆圆] 访问苏联
[圆缘] 友情
[圆缘] 深情感念的岁月
[圆缘] 异乡情怀
[圆元] 书被催成墨未浓
[圆元] 护花使者
[圆员] 天若有情天亦老
摇摇——悼汤密·葛柯伦
[圆愿] 往事
摇摇——一段情
[圆圆] 下午茶
[圆圆] 万朵烟花忆旧游
[圆猿] 外祖父廖凤书和他的《嬉笑集》
[猿圆] 我的老师

北京城的童年

父 母 的 婚 姻

摇摇我是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国北京有名的协和医院出生的，当时的北京还称为北平，北京是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后，才将北平改名为北京的。

陈家祖籍原为福建，后经祖父陈庆云移居至广东南海。祖父是商贾，年轻得志，做过中国招商局局长，在任时认识了外祖父。祖母曾氏和外祖母邱氏当时都怀着孩子，于是两人相约若是一男一女则结为亲家，若是两个男儿将让他们结为兄弟，若同是女的则结为姐妹。其后陈家得子，廖家弄瓦，我父母的婚姻可以说是指腹为婚。

摇摇奉父母之命的结合

我的母亲廖香词和她的兄弟姐妹多在欧美上学，父亲陈应荣也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得了法学博士，后来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哲学博士学位，深受欧美文化影响。母亲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读音乐和绘画，对于欧洲有一份情缘。她对于中国的盲婚自然有莫大的反感。父亲是长子，十三岁丧父即被寡母送到英国的伦敦读书，也深受英国习俗的影响。我的父母都是“奉父母之命”自欧洲回家，其时外祖父在古巴当公使，结果父母便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结了婚。

外祖父母虽是西化但不脱离传统习俗，而父母年轻、西化，可能都希望自由婚姻。但清末民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代，中国仍是非常封建的社会。母亲是由外祖母亲自到罗马把她带到古巴去的；父亲也奉母命自伦敦回国省亲，然后

自广州到古巴。这些往事都是我的九姨（钱乃文的夫人）亲自告诉我的（钱乃文夫妇在抗战时期为了照顾外祖父母，留在上海沦陷区，没有到大后方）。

风光的廖家大户

孩童时在北京，我们一家是和外祖父母同住的。当时在北京住的是东总布胡同，三栋房子连在一起，第一栋是外祖父母和未出嫁的九姨和十姨同住；第二栋是我的父母和我的大姐、三妹同住；第三栋是三姨和她的丈夫沈觐鼎先生（目前仍健在，一九九五年刚过百岁生日）所住。三栋房子是不相连的，外祖父为了各家大人、儿童以及佣人往来方便，把围墙拆掉了，所以各户串门子是很方便的。三姨丈和三姨也有两个男孩，这两个男孩一个叫沈祖荣，一个叫沈祖勋，大的年龄和我大姐相近，老二好像和我同龄。他们是我和姐姐两人的儿时玩伴。此外还有五舅父，他娶了贺家的千金小姐和贺家两老同住。

外祖父廖凤舒先生因为在外交部做事，两个女婿即我的父亲陈应荣和三姨丈沈觐鼎和儿子老五都入了外交部工作。贺家是金融界大佬，排场很豪华，当然外祖父当年在北京也是很风光的人物。外祖父和当时的名人唐绍仪（曾任总理）是知交，常有来往。六姨廖六薇嫁与比她年岁大很多的许崇清（曾任教育部长，也于六十年代担任过中山大学校长），六姨于一九九二年在广州去世，她的大女婿即现今仍在北京做官的科学家朱光亚，他的妻子许慧君和我同年，比我迟出生数月，是我的表妹。三姨红颜薄命，因肺病死于北京协和医院。三姨丈多年后才续弦，但我们保持关系，时相往来。后来他在台北退休，我到台北时也常去看望他和他的夫人露蕙丝·玛利亚（出身外交世家，母亲是法国人）。五舅父和廖家的男女一样，都有

北京城的童年

语言天才，大家喊他廖亨利，会说多国语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在纽约联合国做翻译司主任，他和贺家小姐离了婚，在纽约又和一位韩国女子结婚，后来就失去联系。八舅父住旧金山，九姨住康州，十姨住加拿大，七姨一直住在上海，这是外祖父廖家的概况。

外祖母邱碧桐三代都住加州，她是在加州受的教育，当然非常西化。外祖母和外祖父在加州结婚后才随着外祖父回中国，我记得外祖母为了要学习中文，还请了一名中文教师。那位标准京片子的中文教师除了教授外祖母中文之外，也跟着外祖母学习英语和法语。

摇摇别致的婚礼

廖家二十年代在北京是大户，外祖父母又喜欢交际。外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在古巴当公使（其时两国没有交换大使，公使就是全权大使），交了不少国际朋友。我的父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结婚，据说婚礼举行时通到使馆的道路都封锁了，以便客人出入。九姨、十姨当年是花童，父亲穿着大礼服，母亲梳着西式的髻发，穿着一套在巴黎特别订做的白纱通花嫁衣，非常漂亮（父母的结婚照是我在多年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仅存的家庭照片之一）。

母亲未嫁前和三姨都在英国女校读书，又到意大利学音乐和艺术（母亲弹钢琴，画油画，三姨学音乐）。据九姨在母亲去世后告诉我，母亲在英国伦敦认识了一位英国贵族，交情颇深，对于父母的指腹为婚提出抗议。当时父亲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也已在牛津大学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但和母亲很少接触。母亲和三姨这对姐妹花在欧洲过着青春少女的梦幻时光，不愿回家，但父命难违，只好乖乖地回到古巴。

母亲在古巴结婚，一年后三姨和姨丈沈觐鼎在北京结婚。

父母亲结婚后，父亲又到美国纽约和华盛顿深造，学习新闻工作。我的大姐陈静宜就是在美京华盛顿出生的。两年后父母亲带着两岁的女儿回到北京，投靠外祖父，那是一个短暂大家庭生活的开始。

摇摇冠盖云集的宴会排场

外祖父母家中的大宴会我还有些印象：我和姐姐在楼上偷看俊男美女闻乐起舞，和躲在后面偷听母亲弹琴，三姨唱歌。我们姐妹两人有时也不禁拍着小手助兴，直到老妈子半拉半扯地把我们送到睡房睡觉为止。

廖家不但排场大，而且又有几朵待字闺中的金花，当然惹来不少惨绿少年。顾维钧先生、叶公超先生和当年年轻的外交官是廖家的常客，这些故事都是后来叶公超先生告诉我的；当然健在的九姨也告诉了我不少往事。十多年前我也从三姨丈那儿打听到一些零零星星的事，但这些年来他年岁大了，记忆力衰退了。另外已故的刘锴先生、郑宝南先生也是常客，郑宝南在担任驻意大利代表时，我还带着女儿到罗马访问过他，他殷勤地招待我们，我们还在罗马的大喷水池中抛下了银币，许个希望愿再访罗马。那是一九六零年底的事了，等我再造访意大利时郑宝南已退休回台北。我在台北多次见到他，现在他已作古了。

从大家庭到小家庭

当外祖父出使日本，我们这个大家庭就散了。而父亲因为到北京师范大学做教务长，我们也跟着搬了家。那时我们住在东城贡院，房子是中西合璧的四合院，很宽敞，院子在房子的中央。我还记得大门前是一片空地，房子四周有围墙，来客进

北京城的童年

入大门后经过一条长廊，长廊尽头自有另一道门，两旁是听差和车夫休歇的地方，通过第十道入口才入正房。我们在那儿住了三四年，因此我对这栋房子印象深刻。如今合上眼睛还能依稀记得那房子的结构；桂花开时的馨香、秋天梧桐叶落满地的景况，仿如昨日。

当年父亲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务长，并兼任英文系主任，工作很忙，但他对于教授工作似乎很愉快，我记得每逢周末常有学生到家来向父亲讨教，有时假日里常有些教授来家串门子。父亲喜为人师，我相信这是他一生较为愉快的时光。

夏天我们全家到北戴河避暑，当时还没有冷气机，只有风扇，六月天北京最热，七月是暑天，到了八月就开始凉快了。那时北京人口不像现在人满为患，空气也没有大污染，虽然还是烧煤球时代，但厨房和起居室隔离得很远，因此对于所谓“空气污染”这个名词还未用着。

我们家里有好几个佣人、车夫、门房、厨子和听差，之外还有负责打扫、洗熨衣服的老妈子，当年还没有洗衣机，全家大小的衣服、床单……等等，都靠老妈子的双手洗熨；夏天有太阳，衣服可以在户外吹干、晒干，冬天的衣服常得在炉边烘干。这个习俗在中国大城市当然已由洗衣机、烘干机取而代之，但在穷乏的乡镇农村则没有多大改善，一切还要靠老天爷。

摇摇难忘的女佣人

小时候照顾我和三妹的是李妈，她和照顾么妹的奶妈——张妈是姑嫂，李妈先来，六妹出生后，李妈又把她的亲戚张妈介绍来做奶妈。而自己的孩子就另找别人照顾。（我们家里的男女佣人大概最少也有七八个，或许还不止这些数。）

服侍母亲的一位女佣人是城里人，长得眉清目秀，口齿伶俐，因为她是母亲的近身女佣，其他佣人对她都有点酸溜溜的味道，她也常常狐假虎威。李妈和张妈常在背后骂她，说她是鬼灵精，她们说她时就说“太太房里的”，喊惯了，真的很难记得她姓啥名谁。那个女人总是穿戴得整齐，白上身，黑长裤，头发梳得黑亮亮的，一个圆圆的髻，髻边常有一朵茉莉花或是其他花朵，一手帕扣在衣襟上。她只照顾母亲，对我们小孩也是爱理不理，但对母亲倒真得照顾得很周到；母亲若是在休息，她就不准我们在母亲房外吵闹，常常说：“到外面去玩，你妈妈在休息。”她的丈夫大概不务正业，到了月底发薪水的时候就来找他的老婆，我们放学回家时，就会见到他坐在门房里和男工说三道四。我年纪虽小但也不禁奇怪：为什么一个精明标致的女人会嫁给这么不中看的男人？

摇摇六妹的诞生

母亲对这个女佣很好，因为她很会照顾母亲的一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六妹出生的那一天（六妹香桃出生时陈家没男孩，只有五个丫头，中国人说是五个赔钱货）。父亲白天把母亲送到协和医院后就回家等候消息，把那女佣留守在医院陪着母亲。我那年也有八岁了，说不懂事也有点懂事，那个女佣一直留守在医院陪着大床，父亲到我们的睡房来说：“你妈又生了一个妹妹。”

在那个年代，中国男人常为了要儿子而讨小老婆，父亲受了西方教育，母亲娘家又非常西化，当然小老婆在陈家是行不通的，但在我弱小的的心灵中，我对那个女佣人很感激，因为她一直陪伴在母亲身旁，对父亲我却有点反感。六妹出生时母亲大概刚满四十岁。母亲的名字——香词是外祖父取的，我们

北京城的童年

姐妹们的名字也是外祖父取的，大姐香菊（她不喜欢这名字，后改名静宜），我是老二香梅，依次香莲、香兰、香竹、香桃。

陈家拾穗

父亲有两个弟弟，二弟应昌，三弟应凯。他的二弟即我们的二叔陈应昌于留学美国后回到中国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二叔参加了中国空军，抗战时被派到印度当武官，接待了不少当年到中国参战的美国空军志愿队飞行员。抗战胜利后加入陈纳德将军组织的民航空运公司，在上海虹桥机场做站长。

一九四九年民航空运公司奉美国政府命令撤退，转移到台湾，在香港、日本、东南亚等地成立分部，经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二叔当时与一位新寡的梅夫人（共产党员）发生恋情，已论婚嫁，决定不与公司进退而守沪滨。二十年间因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复杂政情，海峡两岸对峙的形势，使我和大陆的亲友消息完全断绝。后来间接由香港方面传来讯息，才知道二叔在“文化大革命”时，因为海外关系和曾在国民党空军服务多年而被斗死。他的第一任夫人也患癌疾去世，他后来与温凤鸣女士结婚。二叔去世后温凤鸣女士定居南京，并被委任为南京政协委员和南京海峡两岸联谊会理事，我第一次回祖国访问时，有关当局还特别派专员送她由南京到北京和我会面，后来我多次回祖国也有机会和她聚首。她已八十高龄，但仍参加很多活动，身体还健康，有一子从商，生活过得不错。我每次到南京得到省市领导招待时，她也经常应邀做陪客。

三叔陈应凯和家人解放前后，曾到香港居住了一个时期，后来还是回到广州。陈家祖居在广州，有一栋三进的大房子，在广州市桃源上街，我于抗战时，在广州未沦陷日军控制前，曾和母

亲一同到过广州看望祖母曾老夫人，她于祖父逝世后即长住广州，那栋房子是道地的南方大户人家宅第。祖父陈庆云是南海世家，年少得志，三十出头就掌管了招商局，除了正室曾夫人之外，又讨了两位妾侍（即姨太太），全家大小共住一屋。两位如夫人都无所出，而祖母则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祖父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据祖母告诉我，祖父对于当时的香港电车公司有兴趣，认为这可以在广州发展，有利于广州市民，于是认购了大量香港电车公司的股票，并规划在广州市发展。可惜当时民风保守，对于新科技更不甚了了，以电车取代坐惯了的轿子和人力车，一般人似乎还不能接受。祖父举债买大量股票，到年终时要还清债务，找了平时认为知己的亲友想借些银钱过年，但都被婉拒。其实当年祖父有房地产做抵押，又有其他物业，但人情冷暖自古已然，祖父大概年轻气盛，一时想不开吧，便从自己的住宅五楼跳楼自杀而死。

祖母当时说这事来得太突然，因为她是小脚，小跑步到窗口前只拉到祖父的长褂一角，但人已从窗口跳下去了。祖父去世后祖母一人承担一个大家庭，虽有产业，但孩子们都未成人，只好负起一切责任。祖母为了大儿子的前途，特别安排把年仅十三岁的父亲送到英国伦敦上英国的私立学校，接受外国教育。这个安排对父亲的一生有甚大影响。年轻丧父，又被寡母送到异邦求学，这一切使我想到一个年轻孤儿的心中一定非常伤痛。父亲到外国留学后从中学到大学都没有机会回家，因为要节省费用和要在暑期工作，直到大学毕业后，外祖父才给了旅费要他回家省母。

外祖父的兄弟是廖仲恺，廖仲恺和他的夫人何香凝是自由恋爱而结婚，何家在香港和廖家在广东都是望族，廖仲恺参加革命，政治色彩甚浓，何家对此颇有意见，但何香凝还是不顾

北京城的童年

父母反对与廖仲恺结为连理，共赴革命。

战乱中的新生儿

一九零五年到一九二五年间，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许多志同道合、反清建国的有志之士都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其中不少志士在黄花岗之役牺牲，后来袁世凯又黄袍加身称帝，虽然时间不长，但也使国民革命受到很大的创伤。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廖仲恺在广州被刺身亡；蒋介石和汪精卫，一武一文政见不同，时有争议；日本帝国主义抬头，苏联共产主义已开始介入萌芽的中国新政治体制，加上国内军阀纷起争雄，国内政局相当混乱。我就是在这非常时代的夏天出生的（在端午节前后）。

姐摇摇妹

摇摇我们一共姊妹六人。我排行第二，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我们的名字是跟着母亲的名字排名的，母亲姓廖名香词，大姊名香菊（她不喜欢这菊字，说是有点像丫头的名字，改名静宜），我是香梅，老三是香莲，老四是香兰，第五是香竹，老六是香桃。我的堂姊妹也以香字排名，女随母字，迷信的人说这是有损母寿的。信不信由你，先母未得享天年，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大姊虽比我长四岁，但我和她的感情最好，关系也最密切。三妹虽比我小一岁，我们感情当然也很好，但不能与大姊的关系相比。其余诸妹，虽然都已成家，分散海外各地，但我们常有往来，保持姊妹间的亲情，这大概与早年失恃有关。因为我们都未成年就是无母孤儿，大家相依为命，尤其是大姊静宜与我，十几岁的女孩，成为家长，又在战乱中，无形中在本该欢乐的童年里蒙上一层暗影。大姊与我主持家务，量入为出，父亲给我们的家用实在不够开支，每到月终就有捉襟见肘之苦。我时年十五就对自己许下了一个心愿：我长大后绝不做守财奴。因我亲眼见过外祖父家道中兴时的荣华富贵，也看到先母赌博时一掷千金，但战争改变了一切，我和姊姊做中学生时，就知道贫贱生涯百事哀那种凄凉的滋味。

我们家中无男儿，中国人说是无人继烟火，我想这在战乱中，父母也只好以“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沦落随百草”来自慰耳。

姊姊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因为她是第一个孩子，是男是女都无所计较，四年后，家人的盼望当然是个男孩，但我使他们

姐摇妹

失望了，因此父亲对我自小就不太喜爱，常常找我的痛脚。大姊却常护着我，替我打抱不平。其时住在我们北平家里的还有一位未婚的二叔父，名陈应昌。这个人脾气古怪，但中英文造诣都不错，他高兴时就教我读书，不高兴时就拿我来出气。我小小年纪，对他又敬又怕；敬爱因他教我读书，也常带我去逛书摊，这是父亲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骑自行车也是他教我的，所以我觉得他还关心我，可是我实在摸不清他究竟为何常发脾气，大概是自认为怀才不遇吧。而我是近水楼台，竟成了他的出气筒，这是我最不甘心的事。但又有谁来卫护我呢？

还好等到我们自北方南迁香港时，这位二叔父也到美国去投考空军，后来就在重庆空军服务，又转入印度。我再与他相见时已是抗战胜利，他去南京，我自昆明去上海。那是一九四七年的事，我已是大孩子，我也不再怕他。我从小未受过任何人的巴掌，他发怒时打过我多次，如今记忆犹新。

二叔父离开中国空军时，我刚与陈纳德将军结缡，也是民航空运公司成立之初，他来找工作，于是就被派到上海虹桥机场做站长，那时他大概已四十出头了，仍未结婚。不久上海告急，陈纳德将军要我先去广州，我离沪前夕，二叔父突然来访，他说：“我们今生今世可能没有再见的机会了。”他有一个私人的秘密，要在我离开之前向我交代清楚。我有点莫名其妙。其时外子深夜还在办公，于是我们两人坐在宽敞的客厅里，面对炉火，万籁俱寂，让他倾吐心胸的积闷。

他说：“是否可以给我一两杯白兰地？”

我命仆人拿了酒杯，把整瓶的白兰地拿来，他喝了一杯酒，似乎是壮胆吧。他仍在踌躇。我说：“你有话，就说吧。”

他很难为情，但后来还是开口了：“你知道吧，我曾暗地里深深地私恋你的母亲，但她对我一点也不关心，而且要你的

父亲把我赶出去。”

我说：“你私恋嫂嫂，这是不对的，母亲不要你住在我们家里是对的。这就是你们常常争吵的原因吗？”我记得父亲和母亲也有争吵，大半是为了这位惹是非的二叔父。母亲和二叔父也有争吵，想来是为了他不肯搬出我家的缘故。我当时只是五六岁的小孩子，哪懂人间恩怨。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二叔父固然不对，父亲更不对，为何要把一个心里没有好主意的弟弟留在家里？

我记得姊姊最不喜欢二叔父，大概因为她较年长，也较懂事，一切看在眼里极不顺眼的缘故。

二叔父又说：“你像母亲，你母亲要我搬出去时，我只好拿你来出气，我对不起你的父亲和母亲，使你无端受辱，更对不起你。”

我听到他的自白当时真有点气忿，更为父母亲不值。我挨他的打骂还算其次，而他竟对大哥的妻子存有不轨的念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对我忏悔的时候我是新婚的少妇，对于人间的恩怨也以二十岁的心情去量度，所以我当时就大怒。我说：“我对你在我的孩童时的打骂虽未忘怀，但已对你宽谅了，但你原来竟是一个恩将仇报的人，父亲对你有何不是，你竟会存非分之想？你为什么当时不搬出去，使得我们家中鸡犬不宁？”

他流泪了，他说：“我当时很年轻，我不懂事，大哥大嫂对我都好。是我不好，因为你母亲的为人太好了，她是我的偶像，我就怕找不到像她一样的妻子，所以久久无法下决心离开你们。”

我当时实在无法原谅他，我说：“我希望以后不再见到你，你以后也不要再来找我！”

姐姐妹妹

他默然良久，又喝了一杯白兰地。

我站起来，唤佣人，我说：“送客。”

他说：“希望你原谅我。”

我没有答话，看着他走出大门。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他，那是我们最后一面。

数年后我和大姊谈及我和二叔父的最后一面，她说：“不要再提起他算了。”

一九七七年父亲八十大寿，女儿们在旧金山替他设宴祝寿。我们姊妹六人都已成家立业，大姊在美国得护士学位，嫁李佑厚医生，现在两人都在台北工作；我在华盛顿工作多年，现在创立航空交通顾问公司，自任经理；三妹嫁方仲民先生，现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工作；四妹学的是数学，嫁加州工程师黄博士威廉，两人都在州政府工作；五妹学的是电脑，现在德州休斯顿某石油公司做研究组主任，她的丈夫关彼德是银行家；六妹在加州大学结业后即与香港商界的冯新聪君结婚，两人在香港都有非常成功的事业。

一九七七年夏，父亲的第一位外孙，三妹的长子在德州结婚，我们姊妹聚首一堂，看到第二代也成家立业，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者孩子们已是大人，惧者时不我予，正是“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母摇摇亲

摇摇母亲去世时只有四十五岁，因此我们母女的恩情，可以说是很短暂的。但在这短暂的十五年中，有四五年我和母亲的感情非常接近。尤其是她去世前的一年，她在病中，缠绵病榻，都是大姐和我陪伴着她。父亲其时已被调到旧金山当领事，据说因在战时向外交部请假未获准，因此一直没有回来看母亲的病，内中情节到底如何不得而知。往事如烟，我也不愿多追问了。

外祖母一共生了四男六女，长子不成器，可说是个败家子，为外祖父母带来很多苦恼。长女就是母亲。老三是次女，即沈觐鼎先生原配，年二十九岁即染肠结核，死于北平协和医院。老四是男儿，未成年即夭折。老五廖承镒也做过外交官，与北平名媛贺小姐成婚，五舅母名门望族，仪态大方，我对她印象很不错，后来五舅在联合国做事，另与韩国女人相好，于是这段姻缘也告结束。老六是女儿，嫁与广东望族许崇清——许崇智之弟。许崇清曾任广东教育厅长，后任中山大学校长。于年前去世。许家儿女（即我的表姐妹、表兄弟，都在大陆）长大后与我家久不往来，也不通讯。老七是女的，现在何处不详。老八是男的，现在美国。老九、老十是女的，九姨嫁钱家，即广东名律师钱树芬之子钱乃文，九姨住美国纽约，九姨丈刚去世。十姨现住加拿大，子女都非常上进。陈家、廖家都是大族，与我同辈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我也数不清楚，更不要说是提名道姓了。

母亲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婚事是由两家父母做主的。祖父陈庆云与外祖父为莫逆交。父母的婚事是真正的指腹为婚。

母摇亲

祖父从商，少年得志，三十几岁即任招商轮船公司经理，但三十六岁那一年因买香港电车公司，投资过多，大年夜债主临门，其他股东又推卸责任，祖父一时气愤，失望之余竟从五层楼的居所跳楼自杀。死后除遗有寡妻二妾外，还有父亲兄弟姐妹六人。父亲嗣云居长，时年方十三岁。祖母变卖田产、珠宝首饰还清债务后，把长子送到英国读书。父亲再回中国时已是牛津大学的法律系博士了。这些都是祖母曾氏亲自告诉我的。

父亲因为年少出国，在英美受教育，所以国学根底不深，后来虽然回国在北平做教授，当报纸编辑，又转入外交部做领事等职，但因为中文不能与人较高下，总有点吃亏。先母也是在欧美长大，上洋学堂，所以我上学时读中文只好靠老师，在家里除外祖父外其余都是一半洋人。连我的姐妹在抗战后期也都到美国读中学和大学。我的教育都是在中国学校完成的，后来再到美国苦习英文写作与演讲及公共关系时，我已是两个小孩子的母亲了。这是后话，以后再讲。

顺便一提的是二位也是廖家的历史人物，即外祖父之弟与弟媳。

我记忆中的廖仲恺的太太何香凝，我的母亲喊她二婶母，我们姐妹喊她二叔婆。抗战初期，她似乎很严厉，我们从北平逃难到香港，在香港读书，二叔婆从何处来香港我已记不清楚，总而言之，我记得我们晚辈无论年岁长幼都很怕她。当时母亲娘家在香港的亲戚很多，每逢喜宴或丧事似乎都是何香凝做长辈，她的一子一女也偶然出现。她的儿子是廖承志，当时似乎是中共的重要干部，女儿廖梦醒与一位李姓的中共党员结婚，但我从来没有见过，据说那时他已在延安工作。廖承志我们喊他表舅父，他刚刚新婚，表舅母好像是经姓人家的小姐。每逢周末，假如母亲提议要去拜望二叔婆，我们姐妹就一定再